

乐观者
的
女儿



乐观者的女儿

〔美〕尤多拉·韦尔蒂著

叶 亮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udora Welty

THE OPTIMIST'S DAUGHT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乐观者的女儿

〔美〕尤多拉·韦尔蒂著

叶 亮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02,000

1974 年 11 月第 1 版 197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0171·299 定价: 0.32 元

内 部 发 行

风雨飘摇 大厦将倾

司 马 平

一九六九年，六十五岁的美国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发表了小说《乐观者的女儿》。此书曾畅销一时，后来又获得普利策奖金。书名“乐观者”，却丝毫也没有提供令人“乐观”的东西，恰恰相反，全书自始至终充满着一派孤寂、空虚、没有出路的气氛。这是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挽歌，也是对整个美国资产阶级当前处境的一首哀歌。

麦凯尔瓦法官的死标志着他的家庭的彻底衰败。法官死后，他的女儿劳雷尔独自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检视父母遗物的时候，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家庭连“屋子本身也在风雨中飘摇”了。这句无可奈何的叹息道出了麦法官家庭的“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当前美帝正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麦凯尔瓦法官一家的经历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一面镜子。法官的父亲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奴隶主军事联盟的一位将军。但是他和他的联盟并没有能够阻止北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步伐，资产阶级完成了美国统一，实现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且连这位将军的家庭也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化了。法官父亲的历史证明，美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确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法

官本人的一生则是与美国转化为帝国主义以后的历史紧紧联在一起的。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迅速发展成帝国主义，并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张牙舞爪，一时之间，颇有点气势不凡。而麦凯尔瓦法官也就是在这个势头上成了一名风云人物。他当过芒特萨卢斯市长，在全州的法律界都有声望。此时麦法官的家庭生活也与他那个阶级一样，正在势头上，得意洋洋。在劳雷尔的回忆中，这一段时间也是他们家庭最美妙的时候了。那时，法官和他的妻子贝基常常高声朗读各种各样的作品，“他们之间交流着的生活气息，以及当时漂浮在书上的词句”都“使他们欣然自得”。可惜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婿丧生，使新婚一年多的女儿劳雷尔成了寡妇，之后又是妻子的失明和死亡。从此，凄凉之雾便开始笼罩这个家庭。曾经是雄心勃勃的麦法官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妻子的疾病和死亡面前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只养成了一种忍耐的功夫”。表面看来，这只是家庭和个人的变故。其实不然，法官和他家庭的这种变化与美帝国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是分不开的。尽管美帝国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气势汹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但是它逃不脱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经济危机在削弱着它，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的风暴在冲击着它，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它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都证明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已经“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因此，帝国主义者再也不可能象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那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而是象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

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法官的“忍耐”功夫，便是这种苦闷的反映。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法官生命的最后阶段。而这就是当代的美国资产阶级社会。麦凯尔瓦，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资产阶级人物，在眼睛动了手术以后，对自己的视力能否恢复既不抱丝毫希望，也不表示什么耽心，他只是照医生的要求一动不动地躺着，对亲人的照料没有回答，对同病房病人的喧闹毫无反应，对医生不负责任的长期“观察”听其自然。他没有激动，没有兴趣，没有焦虑，没有挣扎，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的精神世界极度空虚，似乎已失去了全部思维能力。“他一心一意在想的就是时间，时间逐渐消逝，他就这么全神贯注下去”。他的女儿劳雷尔知道他快要死了，拼命设法要给这具奄奄一息的躯壳注进新的希望，然而毫无用处。他的后妻法伊看不到这是死亡的征兆，受不了这种冷漠的待遇，对他又叫又拉，“想把他吓得活过来”，结果反而加速了法官的死亡。这些，是很值得寻味的。劳雷尔也好，法伊也好，所害怕的绝不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家庭的颓败和自己前途的无望。但是她们不懂得，她们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是与美国资产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今天，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变成了一具毫无生命力的躯壳，她们怎么能在法官的身上注入新的希望，或者把他“吓得活过来”呢？

列宁说过：“绝望是行将灭亡的阶级所特有的，……是那些不了解祸害的来源、看不见出路和没有能力进行斗争的人所特有的。”正是这样。象麦法官一家这样对生活和前途绝望的情绪，在当代的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我们的时代决定的，是今天的世界发展的总趋势所决定的。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显示了无比的威力，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的革命动力。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风暴，震撼着帝国主义这座高楼大厦，两个超级大国的日子很不好过。几乎在这篇小说出笼的同时，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社论哀叹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美国而言是“地震的十年”，是“火山爆发的十年”；在美国“很少有那个十年象这十年那样在如此广泛的方面引起如此激烈的震动”。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面临着“动乱的深渊”。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虽然看起来还在张牙舞爪，实际上也是内外交困，十分虚弱。帝国主义这种腐朽、混乱的社会现实在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忧郁、沮丧和绝望。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全国处于一种精神衰退状态”，“面临着‘集体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上的崩溃表现于其对理想、政体和前景的缺乏信心”。《乐观者的女儿》正是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精神危机”。

可是，资产阶级是不甘心承认自己的失败的，他们总要以妖言惑众、自欺欺人。就是这个骨子里已完全丧失信心的麦法官，表面上却还要强作镇静，给自己打气。他在前妻病危、自己束手无策时，“开始蹙着眉头自称是乐观者”；及至他自己必须动手术时，为了掩盖他那无可奈何、惶恐万状的心理，又一次宣布自己是“乐观者”。对此，考特兰医生说：“我不知道

世上是不是还有这么一种怪物”。当然，考特兰医生的眼睛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世界；他看不到也不愿看到近在咫尺的美国无产阶级正在逐步兴起的力量，看不到信心百倍的、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地位，创造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早已找不到乐观者了——这倒确是铁一般的事实。

美帝国主义的大厦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摇摇欲坠。麦凯尔瓦家这座大厦也在倾颓、倒塌。支撑这个家庭的人物——麦法官的前妻贝基、麦法官、劳雷尔的丈夫菲尔——一个个倒下了。现在剩下了劳雷尔和法伊。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将来，也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将来。她们将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她们能不能撑住即将倾倒的大厦？事实证明，不能。

“乐观者的女儿”劳雷尔代表着正统的美国资产阶级。她很看重自己家庭的传统，与自己的父母一样保守而有“教养”，她敏感到大厦将倾的厄运，也很想支撑一下。但是席卷美国资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在这位劳雷尔小姐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家庭的历史，社会的现实使她得出一个结论：“不再相信有谁可以得救”，任何人都“不能从别人方面得救。”过去，她没有能救出自己的父母，现在她也无法摆脱自己面临的深刻矛盾。父亲的棺材还没有入土，早已潜伏着的家庭内部的矛盾就开始激化了。站在矛盾两方的不仅是劳雷尔与法伊两个人，而且还包括麦法官家的朋友和法伊娘家奇萨姆家的人。劳雷尔看不惯法伊那种处处从自我眼前利益出发、不顾传统、不顾情面的处世态度，麦法官家的朋友们也都在劳雷尔面前指责、嘲笑法伊；而法伊则摆出一副家庭唯一主人和掌权者的架势，公开表示不欢迎劳雷尔，不欢迎那些三朋四友“随随便

便地”在她家作客。法伊的母亲奇萨姆太太更是看中了麦法官家的房子，想把他们一大家子人搬到这里来住，或者用这房子办个寄宿舍。在这两派人之间展开的是一场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一场争夺财产权和支配权的斗争。这种派系对立、分崩离析、倾轧争夺，在当代的美国社会，比比皆是。这也是它的制度本身带来的。目前，政治经济危机日益深重，更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彼此埋怨、互相攻讦、吵成一团。真是有“说不出的烦难”。这表明：帝国主义这座大厦即将倾倒了。

当然，作者不愿意也不可能正确解释麦法官家内部矛盾和必然崩溃的原因，只好乞灵于人性论，编造一套谎言，把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说成是什么“过多的爱与过少的爱之间的竞争”，甚至说什么“任何生命，都只是生命的爱的继续”。似乎只要有了“爱”，人们之间就可以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任何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作者无限同情的劳雷尔，就是这种“爱”的追求者。她想把“爱”作为庇护所，来摆脱自己的困境。然而到哪里去找这种“爱”呢？法伊且不去说。就是那些看来十分关心劳雷尔父女的朋友们身上又何尝有这种“爱”呢？不错，他们热心地参加了麦法官的葬礼，并且让“银行停止了营业，广场上的店铺大部分答应到举行葬礼的时候休息，郡政府也停止办公”；他们为死者编造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把他打扮成“十字军的英雄”，“人世间的一位天使”；他们还为劳雷尔出谋划策，希冀这个家庭能在劳雷尔身上延续下来。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什么“爱”的表现，只不过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好比大观园里死了个贾母，许多人哭得死去活来，哪里是哭贾母呢？各人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都在为自

己哭啊！于是，劳雷尔又把眼光转向过去。她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回忆并且竭力美化过去的一切，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她感到“回忆象春天一样回来了，回忆具有春天的性质”。可是，回忆并没有给她带来春天。相反，她听到了丈夫菲尔的“我要生活！”的呼声。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和绝望。她不可能给死去的丈夫以“生活”。最后，她抓住了母亲生前用过的一块和面板。她从这块板上“看到了整个经历……整个确实可靠的过去”。她“紧紧捏住那块板。她把它高高举在头顶上，而且，一时间，好象她是在河里的木筏上，她正是捏牢了这块和面板，这才使她没有滑进河底，而别人却早已淹没了”。看，这位“聪明”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小姐堕入了多么可悲而又可笑的境地！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啦。但是，那结果也不美妙。歇斯底里的幻觉毕竟不能代替现实，和面板也不是救生板。现实使她不得不承认她和她的阶级过去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过去跟躺在棺材里的父亲一样，既不会帮助人，也不会伤害人。过去就跟他一样，无动于衷，永远也叫不醒了”。于是回到“过去”的希望幻灭，她陷入了更大的绝望。

其实，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极力鼓吹这种超阶级的“爱”了。几百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爱”“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许多资产阶级作家曾经幻想用“爱”来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救治这个社会，他们开过形形色色“爱”的药方，可是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疾病”，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无可挽救地衰败下去。今天，对于病入膏肓的资本帝国主义社会，韦尔蒂更是开不出什么新鲜的救世良方了，她只能哀叹现实生活中“爱”的缺乏，并把“爱”充作一种苦味的止痛剂，聊以慰藉主人

公劳雷尔的孤寂。可是，这哪里会有半点效用呢？

法伊和劳雷尔不同。她根本不去想“过去”，“谁的经历？谁的过去？反正不是我的。”“我是属于未来的。”

资产阶级中跳出一个“属于未来”的法伊，似乎还有点希望？可是法伊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当麦法官决定眼睛要开刀的时候，她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干脆把这件事全都忘掉算啦。造化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医生。”可见她是把未来交给造化即上帝的。实际上是她根本不敢想未来，只要今天能够活下去也就心满意足了。西方音乐界不是曾经有过“硬壳虫”之类的流派吗？法伊就有点象这种“硬壳虫”。他们给自己身上披上一层硬壳，目的是要欺骗自己，麻醉自己，忘掉对未来的恐惧，落得个“今日有酒今日醉”。但是，那层硬壳一点也不能保护他们，历史的车轮照样从他们的硬壳上压过去，把他们碾得粉碎。可以断言，法伊也不会有美好的未来。法伊也撑不起麦凯尔瓦家的大厦，撑不起资本主义的大厦。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中某些“世界末日”的预言者来。他们似乎与劳雷尔不同，也与法伊不同。他们预感到自己的末日，但不甘心，所以编出一套世界末日的鬼话来吓唬人，颇有点阿Q精神！“我没有未来吗？你们也没有，哼！”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历史自有它自己的轨道。反动阶级的任何挣扎和反抗都是无用的。

今日的世界，帝国主义在“动乱深渊”中加速沉沦，人民革命的洪流正汹涌澎湃、滚滚而来，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与混乱、绝望、灰暗的超级大国

的状况相反，全世界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形势大好。并且正在更加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当前，我国人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激发了更大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我们正在满怀豪情地勾勒着未来的宏图。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情景啊！让一切反动派去哀鸣吧！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美国也有它的未来，但它不属于劳雷尔和法伊，而属于美国人民。

1

一个护士给他们拉开门，麦凯尔瓦法官先走进去，他的女儿劳雷尔和妻子法伊跟在后面，他们走进了医生将要为他检查的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麦凯尔瓦法官今年七十一岁了，他个子高高的，动作迟钝，照例戴着一副系着缎带的眼镜。这会儿，他把眼镜拿在手里，坐在比医生坐的凳子还高的那只王座似的转椅上，劳雷尔和法伊分立在两旁。

劳雷尔·麦凯尔瓦·汉德是个四十四、五岁的妇女，细长的身材，娴静的外表，头发的颜色还是很深。她穿的衣服式样和料子都很别致，不过，她那套衣服在新奥尔良说来，还是冬令服装，裙子上有着一道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显出缺少睡眠。

法伊穿着一件缀着金钮扣的衣服，显得个子瘦小，面色苍白，一只穿着凉鞋的脚轻轻地敲着地板。

这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新奥尔良人全都在城外。

考特兰医生准时来到了，他阔步穿过房间，同麦凯尔瓦法官和劳雷尔握握手，他们还得把法伊介绍给他，法伊同麦凯尔瓦法官结婚还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接着，医生在凳子上坐下，脚跟搁在横档上。他仰着脸，凝神端详，仿佛在新奥尔良等候麦凯尔瓦法官的就是他——为的是要送给这位法官一件礼

物，或者等着法官给他带来一份礼物似的。

“纳特，”劳雷尔的父亲开口了，“麻烦的是，也许我不象过去那么年轻了。但是，我却相信我这双眼睛有点不对头了。”

考特兰医生，这位著名的眼科专家，仿佛世上的时间都属于他似的，叉起了那双乡下人的大手。在劳雷尔看来，他那些手指是多么灵巧，似乎只消碰一碰手表的表面，就能准确地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

“算起来，这一点不舒服是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①那天开始的，”麦凯尔瓦法官说。

考特兰医生点了点头，好象对这一点不舒服来说，这倒是一个好日子。“请把这一点不舒服说给我听听，”他说。

“我已经进了屋子。那会儿，我刚刚修剪了一阵子蔷薇——你知道，我已经退休了。我站在前门廊那一头，望着街上——法伊已经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凯尔瓦法官一边说，一边望着法伊，露出宽厚的微笑，可是，看来却很象是不高兴的样子。

“我只是上街到美容室去，让迈蒂斯给我卷卷头发，”法伊说。

“我看了一会儿无花果树，”麦凯尔瓦法官说，“就是那棵无花果树！那几只旧的吓鸟器发出阵阵闪光，那还是好多年以前贝基觉得应该给缚上去的！”

两人都微微一笑。他们虽是两代人，却是同乡。贝基就是劳雷尔的母亲。那些自制的小小的反光器，是一些铁皮圈圈，在七月里，根本赶不走来吃无花果的鸟儿。

^①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他的生日是2月22日。
——译者

“纳特，你也一定记得，那棵树就栽在我家后院和你母亲用来作牛棚的那个地方的中间。但是，当我转过头去朝法院那边看的时候，它仍直对我闪，”麦凯尔瓦法官继续说下去。“所以，我不得不断定，我连背后也看得见东西了。”

法伊哈哈大笑——一种单调而尖锐的笑声，跟乡下佬的笑声一样可笑。

“不错，那是不舒服的。”考特兰医生在坐凳上向前转动。“我们就来好好地看一看。”

“我看过啦，我看不出里面有些什么，”法伊说。“也许是那些个枝丫呀，有一枝戳了你一下，亲爱的，不过，它没有留下刺来。”

“不消说，我的记忆力已经不行啦。贝基准会说我活该。攀藤植物在开花以前，本来就不是修剪的时候，”麦凯尔瓦法官依然推心置腹地继续说下去；医生的脸跟他的脸贴得很近。“但是，我发现贝基的攀藤植物是不大会凋谢的。”

“不大会，”医生悄莫声儿地说，“我相信我姊姊从贝基小姐那里剪来的一枝攀藤植物，至今还在生长。”不过，在他探过身子去关灯的时候，脸色显得十分恬静。

“多黑呀！”法伊轻轻地叫了一声。“他干吗非上那儿去不可，去跟那些个荆棘搅在一起呢？就因为我出去了一会儿吗？”

“因为在家乡，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从来就是修剪蔷薇的好日子，”医生声音亲切地说。“你本该要阿德尔过去给你修剪的。”

“啊，她是要帮我修剪，”麦凯尔瓦法官说，把手轻轻一挥，好象在谢绝她似的，“当时，我想我应该也懂得一点儿修剪的

诀窍。”

劳雷尔曾经看过他修剪。双手拿着一把大剪刀，象在跳着一种累人的莎拉邦舞，这边剪一枝，那边剪一枝，仿佛是在向他的舞伴鞠躬，弄得矮树丛也大惑不解。

“从那次以后，你还感到什么不舒服吗，麦法官？”

“啊，视觉有点儿模糊。就象当初那点儿不舒服，我根本没有去注意它。”

“所以说，为什么不听凭造化来安排呢？”法伊说。“我一直就是对他这么说的。”

劳雷尔刚从飞机场来到这里。她是从芝加哥乘夜班机来的。她对这次会面，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还是在昨天晚上的长途电话中商定的。她父亲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芒特萨卢斯老家，不喜欢写信，专爱打电话，但是，这回的通话，他说话不多，使人觉得奇怪。临末，他说，“顺便提一下，劳雷尔，近来我的视觉有点儿小毛病，我想让纳特·考特兰有个机会看看他能找出点什么来。”他还补上一句，“法伊说她要跟我一起去，顺便买些东西。”

他这样对自己表示担心，正跟他说身体有毛病同样使人觉得新奇，于是劳雷尔乘飞机赶来了。

医疗器械上那只亮得教人难受的聚光镜，仍然悬在麦凯尔瓦法官紧绷着的脸和医生那张看不见的脸的中间。

最后，天花板上的吊灯又亮了，考特兰医生站了起来，仔细端详着麦凯尔瓦法官，麦凯尔瓦法官也仔细端详着他。

“我想我是在给你带来一点事儿，好使你忙碌一阵子，”麦凯尔瓦法官以合作的声气说，这是他在退休以前经常要说的一句话。

“你右眼的视网膜已经剥离啦，麦法官，”考特兰医生说。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装好的，”劳雷尔的父亲说。

“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需要马上修补。”

“行，你什么时候能动手术？”

“戳了一下就得动手术？那些老蔷薇干吗不给我都死啦？”
法伊叫了起来。

“可是，这只眼睛并没有给戳过。毛病不是出在他眼睛的表面，而是在里边。闪光嘛，也是这样，他用来看的那部分出了问题啦，麦凯尔瓦太太。”考特兰医生从法官和劳雷尔那边走过来，向法伊招招手，叫她到他挂在墙上的那幅挂图跟前去。她身上发出一阵阵香水味，走到挂图跟前。“这是我们眼睛的表面，这是内部，”他说。他在挂图上指出该怎么办。

麦凯尔瓦法官弯下身子，跟坐在他下边椅子上的劳雷尔说话。“那只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他说。

“我真弄不懂，为什么偏偏要让我碰上这种事，”法伊说。

考特兰医生引着法官走到门口，进了回廊。“你就在我办公室里随便休息一下吧，先生。让我的护士再打扰你一下，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他回到诊察室后，坐在病人的坐椅上。

“劳雷尔，”他说，“我不想自己动手做这个手术，”他迅速地继续说下去，“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的母亲。”他掉过头去，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直望着法伊。“我的家庭跟他的家庭是老世交了，”他对她说——这句话，除非是对没有说过的人提醒一下，那是从来不说的。

“是在什么地方剥离的？”劳雷尔问道。